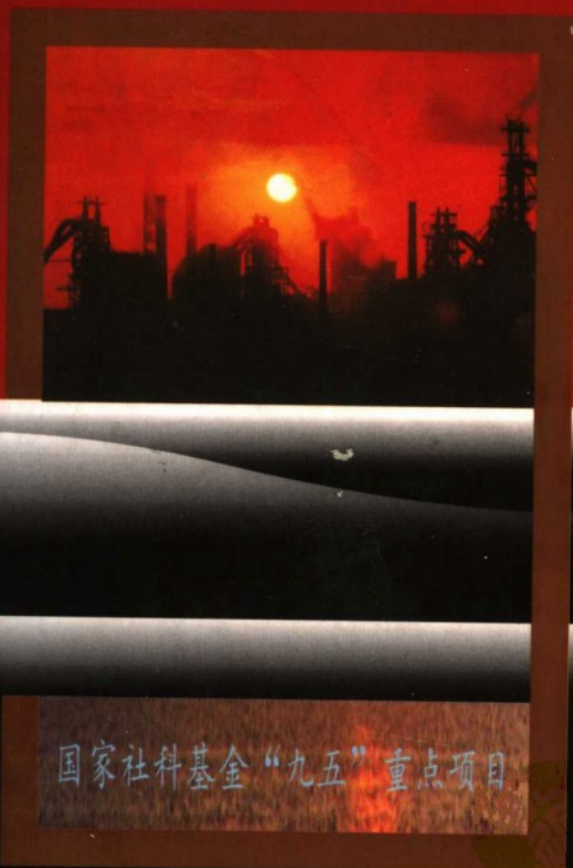


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 丛书

程伟 主编



国家社科基金“九五”重点项目

辽宁教育出版社

李平 高闯 著

企业创新 / 困境与出路

企业创新 / 困境与出路

李平 高闯 著

A red-tinted photograph of an industrial facility, likely a refinery or chemical plant. In the foreground, there are several tall, dark smokestacks or distillation columns. In the background, a large, complex industrial building with many windows is visible. The entire scene is bathed in a deep red light, creating a somber and industrial atmosphere.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企业创新:困境与出路/李平,高闯著.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9

(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丛书/程伟主编)

ISBN 7-5382-5252-5

I. 企… II. ①李… ②高… III. 国有企业-企业管理-研究-辽宁 IV. F279.27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2769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154 千字 印张:6 $\frac{1}{8}$ 插页:5

印数:1—1 850 册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云东辉

责任校对:刘 春

封面设计:林胜利

美术编辑:宋丹心

版式设计:赵怡轩

定价:11.00 元

主 编 的 话

1996年1月11日,辽宁大学经济学科的“三院一所”(经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国际经济学院、经济研究所)与辽宁省委宣传部在辽宁大学联合举办了《“两个转变”理论研讨会》。与会的百余名学者、政府官员、企业家提交了74篇学术论文或专题报告,并就一些重要的问题面对面地交流看法。1月18日,《辽宁日报》以“创新的实践呼唤创新的理论”为题,用整个理论版对这次研讨会的主要观点做了综合报道,在更大的范围引起重视和好评。

研讨会获得超出预想的成功,使我萌生新的想法:以我校经济学科的中青年教授、博士为主体,搞一套系统梳理辽宁经济问题进而探索振兴思路的丛书。一来,促进跨世纪师资队伍学术水平的提高;二来,为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更加积极的贡献。我将这一想法与经济研究所的李平、杨玉生、张凤林、林木西四位教授沟通,大家一拍即合,随即组建起课题组。至此,撰著

《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丛书，明知难度很大，但已经是横下一条心了。

辽宁作为全国的老工业基地之一，国有企业多，经济存量高，历史包袱重，现实矛盾突出，是计划经济的“重灾区”，无论改革还是发展，都面临异常严峻的困难，需要有比较熟悉辽宁问题的专家、学者提供专门的研究成果予以支持。我们还从另外一个角度或更高的层面，来认识撰著本书的意义：辽宁是我国的一个大省，又是我国改革大业步入以制度创新为其基本特征的攻坚阶段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实施场所，愈来愈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所以，振兴辽宁绝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区域性问題，而是与全国的改革、发展和稳定有着极强的关联度。甚至还应看到，振兴辽宁也愈加受到国际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因为老工业基地如何抑制衰退，再创繁荣，在国外，包括在西方发达国家，同样也是一个棘手的难题。

或许，正是因为丛书作辽宁文章，其意义却超出辽宁的局限，当我们1996年初申请国家社科基金“九五”重点项目时，顺利地得到了批准。这使我们振奋，同时，压力也加大了。

为这套丛书确定怎样的定位？这是我们首先集中讨论的问题，并最终达成了共识：

——我们是理论工作者，不谈理论我们就没有优势，但又不宜把这套丛书写得理论色彩过重，因为它应该拥有关心辽宁乃至整个中国改革与发展的、从事不同职业的、具有不同文化程度与知识结构的广大读者。

——我们是文斋学者，虽然也经常闯荡社会，为撰写这套丛书又集中了一段时间从事社会调研，但把它写成拿过来就能用的、具有鲜明对策性特点的著作，终究不是我们的长项，实事求是地说，也是我们力所不能及的。

——我们是现实主义者，撰写这套丛书是以理清辽宁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成因为重要线索（这是进而制定解决问题的政策与措施的先决条件），立足于启发性，同时兼顾理论性与对策性。试图借助于启发性，为理论性与对策性的有机结合架起一座桥梁。如果我们的劳动能够给读者提供一些旨在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的新的观察视角，新的分析工具，新的思维路径……那么，我们也就达到了有限的预期目标的彼岸。

这套丛书是地地道道的集体智慧的结晶。课题组总计二十六名成员：有李平、杨玉生、张凤林、赫国胜、穆怀中、高闯以及我本人七名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有徐平、黄继忠、崔日明三名教授（在读博士生）；有高静娟（在读博士生）、杨志安（博士）、王厚双（在读博士生）、王韶玲、赵瑾（在读博士生）、刘俊奇（在读博士生）、陈德君七名副教授；有讲师八人，其中在读博士生二人，硕士六人；有助教、在读博士生一人。大家分为八个“支队”，用了大半年的时间边搜集资料，搞社会调研，边分别提出写作大纲草案。在此基础上，先后召开了六次课题组骨干成员研讨会，对八本书的写作框架以及主要内容和观点一个一个“过筛子”，群策群力，不断完善。1996年底，由李平教授协助我，对每本书的具体纲目做出最后

的协调与斟酌。

1997年,香港回归、十五大召开和江主席访美三件大事令世人瞩目,使之成为值得全国人民永远记住的一年。这一年,也是我们课题组成员苦熬心血、埋头写作的一年。当举国共享胜利的喜悦辞旧迎新之际,八本书疲惫的作者们刚好也如释重负,陆续完成初稿。我逐一审阅,提出修改意见。大家稍作歇息,又重新进入紧张的工作状态,向终点冲刺。——1998年5月,《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丛书定稿。

我们努力了,拼搏了。党和人民培养了我们,我们只是做了我们应该做的、我们能够做的一点事情。丛书的问世,使我们感到宽慰。丛书涉猎的范围广,领域宽,难题多,而我们的学识、水平和能力是有限的;况且,改革与发展的实践远未完结,也永远不可能完结。这就决定了我们的这项工作只是初步的尝试,难免会有不妥之处。祈希读者批评、指正。

十分感谢辽宁教育出版社给予丛书编写、出版的财力支持。辽宁教育出版社的乔平同志,作为丛书的策划,尽心尽力,尽职尽责,从丛书立意的论证,到写作大纲的研讨,再到八本书初稿的审阅与修订,他全程参与,做出了课题组成员公认的重要贡献。

十分感谢辽宁省、沈阳市一些政府职能部门、科研单位和企业的同志(详见每本书的“后记”)。他们不仅为课题组成员从事实地调研提供了方便的条件和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而且还为丛书的撰著献计献策。

十分感谢我们的三位顾问,冯玉忠、高东晓、常卫国

同志。我每每向他们汇报丛书的总体构思、框架设计以及具体内容,他们每每提出重要的指导性意见。在丛书定稿的过程中,他们更是一丝不苟,仔细审阅,认真把关。

十分感谢辽宁省委书记闻世震同志。他对我们的这项研究工作给予了重要的关注,并欣然接受我的请求,为丛书题写了书名。这是闻书记对我们中青年学者的巨大支持、鼓励和鞭策。

我们将这套丛书献给:

- 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
- 辽宁大学四十年华诞

程伟

1998年5月28日



目 录

1 历史遗产与初始条件.....	(1)
1.1 辽宁国有企业的基本特征	(2)
1.2 传统计划体制的历史遗产.....	(17)
1.3 辽宁国有企业的现状与绩效.....	(23)
1.4 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27)
2 技术改造与现实困境	(30)
2.1 历史遗产与技术改造的尝试.....	(31)
2.2 技术改造与资金供给的约束.....	(36)
2.3 技术改造与筹资成本负担.....	(41)
2.4 技术改造与技术类型的选择.....	(46)
2.5 技术改造与制度安排的效率.....	(51)
2.6 技术改造与实施绩效评价.....	(56)
3 制度变迁与经济效率	(61)
3.1 承包制与剩余索取权的分配.....	(63)
3.2 所有者的约束与企业内部人控制.....	(72)
3.3 企业家选拔制度与企业家的激励.....	(81)
3.4 企业就业制度转型与劳动者行为变化.....	(90)
4 资产重组与结构调整	(98)
4.1 市场约束硬化与企业规模调整刚性	(100)
4.2 企业资产重组与企业一体化的条件	(109)
4.3 企业一体化与非一体化及其案例	(119)

4.4 企业资产重组与所有权重组	(135)
5 创新路径与政策选择	(144)
5.1 改革的轨迹与创新的路径	(145)
5.2 下个阶段的改革与政策选择	(155)
5.3 结束语：企业改革依赖更广泛的制度创新 ...	(175)
参考文献	(177)
后 记	(186)



1 历史遗产与初始条件

迄今为止，辽宁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进行了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在这二十年中，多种的改革思路并进与交错，多项的改革措施配套与变化。尽管如此，仍未从根本上改变辽宁国有企业经济绩效不佳甚至恶化的困境。十五大的召开，表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国有企业改革成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辽宁作为一个国有企业在全国占有较大比重的省份，其国有企业改革任务的艰难自不待言。尤其最近中央领导同志视察辽宁，提出要在三年内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摆脱困境，使辽宁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变得更为艰巨。企业、政府以及学术界的专家、官员和学者集思广益，提出了各种搞好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政策建议和实施方案。然而，从逻辑的角度看，提出如何摆脱辽宁国有企业困境的方案，设计和寻找走出困境的出路，首先要探讨的问题应该是：辽宁国有企业的困境是如何形成的？什么原因造成目前的困

境？是国有企业自身内在的原因还是宏观环境等外部原因造成的？是历史形成的诸多因素影响国有企业的效率，还是现实中的政策措施制约着国有企业绩效的提高？为什么各种改革措施和配套方案的实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和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各种政策措施的实施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各种配套的改革措施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联系？在这些问题没有搞清楚之前，我们能否设计或寻找出摆脱国有企业困境的出路，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因此，研究辽宁国有企业目前所处的困境，解释这些困境形成的诸种原因，探索如何摆脱困境，以及寻找走出困境的出路，构成本书的逻辑线索和中心内容。本章，我们首先描述一下辽宁国有企业的内在构造和基本特征，接着，探讨传统体制给辽宁遗留下的历史遗产和改革的初始条件。然后，概述辽宁国有企业目前所处的困境，最后，我们给出本书的结构安排，使读者能够清楚地了解本书的研究线索。

1.1 辽宁国有企业的基本特征

辽宁的国有企业是在 50 年代初期，随着国家选择宏观经济政策和制订发展战略而发展起来的。建国初期，由于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政治经济环境，特别是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处理国际事务关系方面所处的冷战状态，使中国不可能依靠发达国家的技术援助、经济援助以及平等互利基础上的自由贸易往来发展本国经济。在这种国际背景下，工业基础落后的中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目标，即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要把大量的资源投入或安排到重工业生产领域中去。重工业属于耗用资本的部门，在中国这样一个资本短缺的国家中，如果采用市场机制把稀缺的资本配置到重工业领域中，资本的价格即利

率就会很高，而比较高的利率价格意味着在重工业进行投资的成本较高。

因此，如果用市场机制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相配合，在实践上会导致两个结果：其一，是产业结构方面的问题。重工业耗费资本较多，如果资本的价格较高，投资成本就会较大，相对而言，轻工业要比重工业较少耗用资本，而更多地是耗用劳动力。如果采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在稀缺的资本使用费用较高的情况下，轻工业就具有比较大的优势。因此，采用市场机制作为配置资源的手段反而会使轻工业而不是重工业发展起来。其二，是经济总量方面的问题。由于发展重工业的投入成本较高，在技术水平和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重工业生产领域所获得的利润就会减少。而利润减少意味着可用于积累的资金不足。这样，积累用于再投资的资金就会不足，这会直接影响再投资的规模。如果投资的规模较小，经济总体的增长速度就会受到影响。这两个结果不符合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目标。因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不仅仅表现为要尽快地改变中国建国初期落后的工业结构格局，而且隐含着要加快经济的增长速度，在短时期内赶上发达国家的愿望。如果采用市场机制把稀缺资本配置到耗费资本的重工业领域中，即使能做到这一点，也会影响经济的增长速度。

因此，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相配合的体制只能是高度集中的用计划手段来配置资本的体制，这就是计划经济体制。由于资本被纳入计划配置的框架，要想使资本发挥作用，就必须保证资本所需要的劳动力、原材料等等也被纳入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并把劳动力、原材料等资源同样配置到重工业生产领域。

计划经济体制为了实现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目标，不仅要把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以集中计划安排的手段配置到重工业领域，而且还要压低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价格，从而压低

重工业产品的生产成本，以保证在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又能有大量的利润从重工业发展中产生出来，以支撑经济持续增长的需要。结果，实行计划体制并人为地压低要素价格就成为与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相配合的一种制度性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因为是由经济发展战略选择所决定的，因而是一种内生性的制度安排^①。

计划体制在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过程中，首先要选择那些适宜发展重工业的地区作为这个战略的重点发展基地。由于辽宁在解放前就已经形成了工业生产基础，加上拥有煤、石油等能源矿产，铁、锰等金属矿产和金刚石、玉石等非金属矿产资源，适于发展重工业，因此，辽宁成为全国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重要实施基地。与此同时，计划经济体制也就成为辽宁工业生产的制度安排，重工业的发展也成为辽宁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完成重工业发展的任务在逻辑上也自然而然地落在国有企业身上。因为私营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必然要求对资源投入有更多的选择权和决策权，而这种导源于私营企业利益追求目标的内在要求，同国家计划要求的集中统一安排和配置资源的目标是相矛盾的，因此，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不仅需要计划体制这样的制度安排与之相配合，而且还需要在计划体制下塑造一个并非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的国有企业去完成这个战略任务。

从辽宁国有企业发展的实践情况看，如表 1.1 所显示的，国有工业企业占全省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的比重 1952 年仅为 16.9%，除去 1958 年的调整使这一比重迅速下降外，其他年份都在逐渐上升，1960 年上升至 61.1，此后逐年下降与上升交替，至改革前的 1978 年，国有工业企业的比重为 25.5%。

^① 林毅夫、蔡昉、李周：《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第 19 页。

表 1.1 辽宁国有工业企业占全省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的比重 (%)

1952	16.9	1967	39.0
1953	18.0	1968	39.4
1957	24.0	1969	31.2
1958	6.2	1970	29.7
1959	46.0	1971	30.2
1960	61.1	1972	30.7
1961	34.3	1973	29.0
1962	25.8	1974	29.7
1963	24.2	1975	28.6
1964	26.2	1976	26.2
1965	29.9	1977	25.9
1966	37.4	1978	25.5

资料来源：《辽宁统计年鉴》，1997 年，第 230 页。

与国有工业企业个数的比重升降波动最初较大，而后又慢慢稳定下来的状况不同，国有工业的工业总产值占乡及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则比较稳定，而且始终在 80% 以上，1965 年达到 93.3%，如表 1.2 所示。这说明，虽然改革前国有工

表 1.2 辽宁国有工业企业占乡及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

1952	83.0	1967	89.8
1953	81.9	1968	89.2
1957	90.5	1969	91.6
1958	90.6	1970	91.6
1959	88.9	1971	90.7
1960	90.1	1972	88.6
1961	87.2	1973	87.7
1962	88.8	1974	86.4
1963	90.3	1975	84.6
1964	90.4	1976	83.1
1965	93.3	1977	81.9
1966	91.4	1978	83.6

资料来源：《辽宁统计年鉴》，1997 年，第 233 页。

业企业个数在全省工业企业中的比重有所变化,有时甚至下降,但显然企业的规模在不断增大,从而形成国有工业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且较为稳定的状况。这就说明80%以上的工业总产值都是由国有工业企业创造的。

辽宁国有工业企业创造的工业总产值,如果从产值的轻重工业分布结构看,主要是分布在重工业中,或者说,整个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的产值是由国有工业企业提供的。从表1.3中可以看出,1952年,重工业产值在全省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为57.8%,此后,随着国有工业企业个数增加,规模扩大,创造的产值比重增加,重工业产值所占比重也在增加。到改革前的1978年,辽宁重工业产值在全省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达73.3%。

表 1.3 辽宁轻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

年 份	轻工业	重工业	年 份	轻工业	重工业
1952 年不变价			1965	26.2	73.8
1952	42.2	57.8	1966	26.1	73.9
1953	39.2	60.8	1967	31.3	68.7
1954	37.7	62.3	1968	29.5	70.5
1955	31.6	68.4	1969	29.5	70.5
1956	27.6	72.4	1970	24.4	75.6
1957	26.6	73.4	1971	23.1	76.9
1957 年不变价			1970 年不变价		
1957	29.0	71.0	1971	24.0	76.0
1958	23.5	76.5	1972	24.8	75.2
1959	25.9	74.1	1973	25.1	74.9
1960	26.8	73.2	1974	26.3	73.7
1961	26.8	73.2	1975	26.7	73.3
1962	29.3	70.7	1976	27.2	72.8
1963	30.2	69.8	1977	28.3	71.7
1964	25.2	74.8	1978	26.7	73.3

资料来源:《辽宁统计年鉴》,1997年,第232页。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辽宁国有企业的形成、发展，直至改革前国有工业企业提供的产值已占全省工业总产值 80% 以上，完全是随着整个国家计划体制的建立，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实施，以及辽宁原有的工业基础和资源禀赋联系在一起的。这样形成的国有工业企业具有如下一些基本特征：

第一，不断地提供重工业产品的国有工业企业需要国家能够不断地提供价格低廉的资本投入为前提。

由于中国属于资本稀缺的国家，在理论上来说，资本的使用价格应是较高的。当需要国有工业企业提供越来越多的重工业产品时，国有工业企业所耗费的资金也越来越多。如果国家并不需要国有工业企业计算生产重工业产品的成本与收益，要使国有工业企业提供愈来愈多的重工业产品，国家就必须能够提供较多的资本设备数量；如果国家需要国有工业企业计算生产重工业产品的成本与收益，在资本稀缺，而且重工业的发展缺乏比较利益的情况下，国家就必须压低资本的价格即压低利率。资本价格压低后，国有工业企业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就可以生产出较多的供资本积累的利润来。更准确地说，即使是需要比较国有工业企业的成本与收益，也不是国有工业企业自身在做这种比较。因为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完全是由国家计划安排的，因此，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并不是企业自身的行为。这种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是国家的行为，因为国家需要发展重工业，同时又需要从重工业发展中积累出大量的利润，以供加速经济增长的需要。

在资本的价格或利率压得很低的情况下，表面上看，生产重工业产品的国有企业能够创造出利润来，这是因为企业注意的是生产重工业产品的会计成本。资本使用费用低，会计成本就较低，利润就会出现。而从国家角度看，生产重工业产品的成本并非仅仅是会计成本，还要考虑经济成本，即把资本资源从本来应当用于轻工业产品生产的领域转移到重工业生产领域